

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三月

袁方先生：
欣逢先生八十高壽，
謹致衷心的祝賀！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

毛泽东主席祝贺张澜先生八十寿辰祝词手迹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

春風嫵娜

柳花

拖東風無力，沈蕩恣邊吹。作雪軟
花錦一條，維它萬絲千。絢非花非
霧情海湧，綠鳥吳音黃。馳紅曲
挽柔情，難上難於翠。佳人洗箸盛一
海子，怨湖山。

中國怒吼了

上海大光明電影院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



中國怒吼了！中國怒吼了！誰說中華民族懦弱？請看那抗日烽火，照耀着整個地球。

中國怒吼了！中國怒吼了！我們已團結一致，萬眾奮起，步伐整齊，不收復失地不休。

中國怒吼了！中國怒吼了！八一三浴血搏戰，愛國健兒，奮勇直前，殺得敵人敬為跋胆。

虎救張善子並錄
三〇三

張善子遺墨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



壬午秋七月晴泉西子退次山莊



葵 晴 泉 遺 墨

目 录

- 张澜先生生平事略吕光光(1)
- 大时代中的漆鲁鱼温田丰(25)
- 毛主席、周总理悼念郭沫若父亲的两付挽联
.....王大敏(75)
- 郭沫若、田汉缙云山题诗记林 材(87)
- 老舍在北碚李莹华(93)
- 沈钧儒《经年》一诗的写作时间尹 凌(105)
- 附：唐弢同志给《大地》编辑部的信
- 赵尧生先生手札书后唐振常(109)
- 老报人周文钦及其生平事业谢任甫(124)
- “虎痴”张善子王东伟(141)
- 清代著名书画家龚晴皋董晏明(164)
- 刘师亮和《师亮随刊》田和平(168)
- “魔王”傅润华孙由美(191)

张澜先生生平事略

吕光光

张澜先生字表方，一八七二年四月二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场佃农家庭。幼年随父耕读，亲身体会贫穷农民的辛勤和疾苦，在他的幼小心灵中萌发了热爱人民的深厚感情。二十五岁中秀才，补廪生，先后执教于南充乡塾和广安紫苻书院。一九〇二年被选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攻经史。

一九〇三年，顺庆府和南充县筹办新学，为培养办学人材，教谕骆文廷以张澜品学兼优，选送至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学习。列强对中国的侵袭和日本的维新富强，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反对东京留日中国学生为慈禧祝寿，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变法维新，被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将他押送回国。

一九〇四年，顺庆府中学堂业已成立。张澜回国后，在顺庆府中学任正教习。所有校中规章制度多出其手。一九〇五年，赴成都任四川游（留）学预备学堂学监。一九〇六年夏，因抗议警察殴打学生，巡警道稽延不理，他愤而辞职，返南充主持教育工作，创办私立两等小学和南充县高等小学，兼任顺庆府中学堂监督（校长）。他主张妇女读书，创办端明女塾，提倡妇女天足，开四川教育革新和妇女解放风气之先。在教学中，他着重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为他半生从事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朱德总司令曾在顺庆府中学肄业，深受他的教

益。①一九〇九年十月，四川省咨议局成立，南充县人民公推他为咨议局议员。他坚辞不就，专心致志于教育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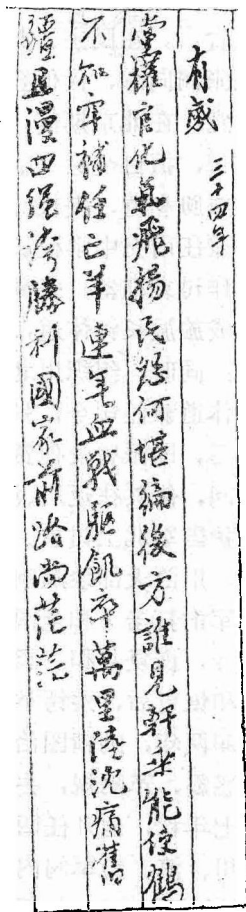
一九一一年辛亥，清廷将原为民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转而将路权抵押予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举借外债，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川汉铁路股本，原系四川督署按丁粮附加征收而筹集的，因之四川人民都是股东。铁路收归“国有”，直接损害人民的利益，四川人民群起反对。南充县人民推举张澜等五人为股东代表，到成都与各州、县代表共商对策。由于他有胆有识，敢于斗争，被选为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代表大会副会长。他和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等领导四川人民保卫路权，成立保路同志会，反对清廷的卖国行径，阻止帝国主义势力的内侵；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成都人民罢市罢课，全川人民抗粮抗捐，逐步形成带有全民性的大起义。这时，同盟会会员吴玉章、龙鸣剑等在川南的革命活动，与此互相呼应，声势日益浩大。四川总督赵尔丰企图镇压四川人民的这场大起义，遂于九月七日，诱捕保路运动的代表蒲殿俊、罗纶、张澜、颜楷、邓孝可、江三嫫、王又新、彭兰村、叶秉诚等九人于督署花厅；特别将罗纶和张澜两人大刀架颈，洋枪抵胸，胁迫他们屈服。张澜临危不惧，侃侃而谈，据理力争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修铁路，断不能认为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认为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为非法。要是出尔反尔，把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去出卖给外国，这将是引狼入室，为害不浅！”他的话充分体现了民族觉醒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行为，和反抗封建专制的民主精神。赵尔丰理屈词穷，拍案大叫：“张澜，你太横强！”当即喝令士兵将他们九人囚禁于督署中，加以“抗命朝廷”之罪，“候旨听斩”。成都

①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七十七、八十四页。

市民闻讯，群情激愤，涌向督署，要求释放九代表。赵尔丰命令士兵开枪镇压，当场死伤约四十人。恶耗传出，激起全川人民更为强烈的反对。各地保路同志会立即进行武装起来，兼程开赴成都声援，汇集成都城郊的武装群众多达十余万人，包括部分起义新军，将成都团团围困。赵尔丰派兵出击，屡遭挫败。清廷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三千入川救援，中途兵变，端方伏诛。赵尔丰于绝望之余，不得不释放九代表。由于鄂军西调，武昌城防空虚，造成了革命起义的有利条件，四川的保路运动也就成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导火线。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同年冬，四川成立大汉军政府，政权初建，各地局势混乱。张澜受命出任川北宣慰使，廉洁奉公，任人唯贤，为民除害，城乡安谧。同时，对发展南充的教育和实业，亦多建树，在职年余，川北大治。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澜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于一九一三年春赴北京就任。他向往民主政治，由汤化龙介绍，参加民主党。当他



张澜《有感》诗手迹
(一九四五年)

发现各党派大都为权利而争夺，党员又大都追逐个人名利，他不屑同流合污。在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之际，蒲殿俊未经张澜同意，代他登记加入进步党；他断然退回党证，从此退出政党。在北京期间，他与蔡锷结识，过从其密。鉴于袁世凯妄图称帝，擅自废除《临时约法》，践踏国会，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丧权辱国，他愤而离京，返南充继续主持教育事业，兼任南充中学校长。

为作讨袁准备，张澜除在南充组织学生军训外，争取驻防川北的混成旅旅长钟体道，广集枪支，增募队伍，扩编为四川陆军第三师；同时，组织川北二十余县民团武装，秘密成立讨袁司令部，钟体道兼任司令，张澜任政务长。当他确悉蔡锷已从北京潜返云南后，即派曾受他资助留日的杜步云前往昆明联系。蔡锷任杜为顾问，使其往返川、滇与张澜联络，一九一五年蔡锷在云南起义，率护国军北上讨袁。张澜立即同钟体道在南充宣布独立，川北全部、川西大部继起响应，以声援云南起义，共同护国讨袁。在护国军的打击下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中，袁世凯被迫取消“洪宪”帝号，恢复共和，袁亦因懊丧而毙命。

共和恢复后，蔡锷举荐张澜任四川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在职两年，励精图治，惩治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举廉能，除恶霸，革陋规，去裨政，人民安居乐业，声誉播满全川。一九一七年秋，他升任四川省省长，全川人民瞩目殊殷；惜为时不久，川、滇、黔军阀内讧，四川形成军阀割据局面，政令不行，他被迫于一九一八年二月，离四川赴北京述职。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张澜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潮。他支持新文化运动，并对学生运动深表同情。他的好友吴玉章常给他讲述马克思主义，心向往之。他出任《晨报》社常务董事，蒲殿俊任社长，李大钊、瞿秋白均参加《晨报》编务，并以《晨报》特派记者名义

资助瞿秋白去苏俄考察。他在《晨报》负责时，支持发表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震动，使他受到责难。与此同时，他支持吴玉章等组织的华法教育会及李大钊、王光祈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他以四川省省长名义，邀同教育总长傅增湘联名，商请交通部，拨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救济京、津、沪、宁、汉等地生活困难的四川学生五六百人；补助华法教育会基金，资助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川学生二百余人的旅费。留法勤工俭学中的不少四川学生，如赵世炎、陈毅、刘伯坚、杨伯恺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革命家。他还嘱咐他的好友鲜英在重庆创办《新蜀报》，聘请肖楚女、陈毅、漆南薰等主持笔政，对西南地区的思想战线，发挥了启蒙的作用。

一九二〇年冬，张澜奔母丧，返原籍。他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在南充创办《民治日报》，宣传民主思想；主张地方自治，实行司法独立，民选法官；开办地方自治讲习所，敦请吴玉章主讲人民权利的理论；发动地方人士兴办实业，改进植桑、养蚕，在各乡场设立苗圃，派技术人员下乡教导，并聘请苏州、杭州的丝绸专家到南充传授缫丝、织绸的新技术。一九二二年，张澜复任南充中学校长，重振南充的教育事业。他首先进行学制改革，南充中学除普通中学部外，增设农、工、医、师范等职业班，附设农场、工厂、医院，供学生实习，强调学以致用，实际上将一所中学办成类似综合大学，为四川有职业教育之始。他号召学生“脱下长衫，放下斯文架子”，参加校内的劳动，并下乡宣传民主政治，反对军阀的横征暴敛，遏制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他信赖四川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张秀熟、袁诗尧等，全权主持南充中学的校务。南充民主学风盛行，吸引川北各县青年前来就学，不断涌现出许多进步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如罗瑞卿、于江震、任白戈、贾子群、李泛山、陈同生、杜桴生、康乃尔等，他们都曾受到张澜倡导的民主思想和追求进步的精神

的薰陶。

一九二五年，张澜创办成都大学，任校长。他主张民主办校，用人唯才，人事公开，财务公开，教职员工均可全面监督校务。他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口号，除罗致四川各方笃学之士来校任教外，并派专人到省外各大都市敦聘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为学习外国的科学文化之所长，他还先后聘请二十多位外籍教师在外语、物理等系担任教职。在学术领域中，使偏处西南的成大，达到当时国内大学的先进水平。张澜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各种学派和不同政治观点兼容并蓄。他允许信奉三民主义的健行社、信奉共产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和信奉国家主义的惕社同时存在，使其各自在校内出刊物、开大会、宣传讲演，呈现百家争鸣局面。由于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学生思想进步，敦品勤学，特别受到他的重视，不惜以他自己的薪俸，津贴他们先后出版《野火》、《定性分析》、《科学思想》等杂志，以致该社发展最快，影响最大。共产党员教授赖名珂、杨伯恺、刘绍禹等受到他的倚重。先后担任中共成大支部书记和共青团支部书记的李正恩、贾子群同他经常接触，关系密切。成都大学也就成为西南的民主堡垒，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阵地。

张澜在任成大校长期间，积极配合中共在四川的活动。一九二六年，万县发生英国军舰炮轰居民的“九·五”惨案，川军驻防万县的宪兵司令、中共地下党员于渊（邦齐）奋勇击退英国军舰，为反帝树立了光荣榜样。张澜在成都积极声援，发动成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等，为配合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在成都创办《九五日报》，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组织“言论委员会”，请张澜任主任，掩护该报，他慨然允诺。

一九二七年，四川军阀王陵基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屠杀杨闇公、冉钧、漆南薰等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张澜

严词抗议军阀的暴行，并要刘湘取消对杨伯恺、肖华清、罗世文、任白戈、陈同生等的通缉令。“四·一二”事变发生，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叫嚣“一个主义”之时，张澜于七月二十四日在成都大学发布《校告》，公开号召：“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校告》公布后，国民党骂他“宣传赤化”，说他是“共产党”，并由四川军阀派一旅长带兵去搜查他的住宅。他却处之泰然，照常不要保卫，独自一人步行数里，到学校坚持办公。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四川军阀向传义在成都逮捕了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尧，以及包括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学生六人（五人为共产党员）在内的十四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当天即予杀害。张澜营救不及，愤而辞去成大校长职，并在辞职书中揭露和谴责军阀的暴行。经成大师生的挽留和社会舆论的敦促，他始复职，与学生们一道继续斗争。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等二十余人在重庆被捕，张澜闻讯，极力营救，终于使多人脱险。一九三〇年，共产党员曹荻秋等在四川广汉发动兵变，成大学生参加者甚众。国民党迁怒于他，通缉成大教授杨伯恺和有关学生，逮捕他的秘书杜象谷，进而对他横施压力，强行将成大并入为国民党所控制的四川大学，迫使他去职。

一九三一年，张澜又返南充，继续办理南充中学，聘请原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学生多人来校任教。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他关怀人民疾苦，发而为诗，先后写了《乡居杂感》七言组诗数十首。其中描写苛捐杂税剥削下的人民苦况，如：“一年须上九年粮，饱暖无期日夜忙；已说罚金加滞纳，又催旧契验田房。”“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国土沦于日寇，他忧伤时事艰难，又写诗道：“眼前百事尽悲观，薄酒孤斟强自

竟；忽念方张华北寇，又令通夜寝难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露诗篇。

一九三二年秋，于江震、李泛山等领导南部县升钟寺暴动，遭到失败，转移至南充、阆中各县，张澜尽力予以掩护。一九三三年春节前后，红四方面军进抵川北，他发动南充人民准备欢迎，贾子群等还参加了接应红军的工作。他期望红军入川拯救川民，御蒋介石集团于夔门之外，以增强抗日的力量。他还劝说曾被红军击败过的川军军长田頌尧与红军联系，避免冲突，使红军利用时间巩固川北根据地。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深感蒋介石集团的压力日趋严重，亟欲联络省外地方势力以自固，邀请张澜以出川考察教育为名，前往宁、沪、粤、桂等地，与反蒋势力作初步的联系。张澜则以东北沦陷，大敌当前，蒋介石不御外侮，积极反共，存心消灭异己，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因之他亦欲借此机会，出川游历，以期能对国内外形势有更多的了解，结识更多的爱国志士，联系某些地方势力，为反蒋抗日作准备。他接受邀请后，率鲜英、杜象谷、任乃强、杨达璋等出川考察。此行，使他对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回川后力主“川人治川”，以反对蒋介石的势力侵害四川。

同年夏末，张澜刚到南充，惊悉军阀杨森阴谋诱歼红军于蓬安县境内，他立即派南充中学工友袁义和星夜奔赴仪陇县马鞍场红军指挥部送信，使红军有所戒备，转危为安。在张澜老家南充西路一带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十分活跃。他的亲友和学生，不少人成为这支游击队的骨干。杨森攻击他“私通共匪”，要加害于他，他只得走避于成都。不料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大搞军阀主义，推行极左路线，人心动摇。四川各军阀乘机加紧“围剿”红军，残杀贫苦农民以“邀功”，迫使人民大量流亡，川北遂呈糜烂之局。张澜对此变化，极为痛心。为收拾川北残局，在

四川绅、商、军、政各界推戴下，他于同年冬，出任安抚委员会委员长。据《新川西北日报》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刊载：

“安抚会是绅的性质，非官的性质。外间误认为安抚会是政治机关，此为一种错误。”至于该会的任务，则以救济为主。他曾提出口号：“一夫不得所，若已推而纳之沟中。”强调救济流离失所者的重要性。为此，他特请民族资本家卢作孚任该会救济组组长，募集捐款，由他专返南充主持救济，安抚流亡，促使生产尽速恢复。在成都的安抚会会务，则由副委员长邵从恩、秘书长刘洒英（青年党员）等主持。一九三五年一月蒋介石反动势力侵入四川后，即将该会撤销。

早在一九二六年，张澜的次子张罅（慕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即赴德国留学，曾任中共旅德支部书记，并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办事处的工作。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台，屠杀共产党人，张罅离德赴苏联，仍任职于共产国际。一九三六年，日寇深入华北，国难更形严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遂电召张罅回国，派至张澜身边工作。在张罅的影响下，使他对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共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积极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张罅又协助他开展四川的统战工作。当年川北大旱，张澜出任川北赈济会会长，募集大量物资，赈济川北灾民。张罅以“赈灾专员”名义，抱病前往灾区施赈的同时，深入老苏区通江、南江、巴中一带，秘密整顿军阀“围剿”时遭受破坏的共产党组织。一九三八年春，张罅积劳病逝，张澜极为悲痛。同年五月，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由延安去武汉，途径成都，向他深致慰问。

蒋介石厉行法西斯统治，于一九三五年初，派参谋团和特务部队别动队等入川。张澜规劝川、康军政首脑加强团结，在由地方势力召开的广汉会议上，他继续强调“川人治川”，坚决与蒋介石的反动势力相抗衡，因之遭到蒋介石集团的攻击，和追随蒋的

四川“耆宿”的诽谤。此后不久，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执行局情报处派干部张曙时到四川，通过张澜介绍，对刘湘开展统战工作。一九三六年冬，张澜促成刘湘派代表张斯可去桂林，签订《红（红军）、桂（广西）、川（四川）军事协定》，以壮大反蒋抗日力量。其后，他又促成刘湘派代表王干青去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又派李一氓为代表来成都。刘湘委托张澜、鲜英、钟体乾等与李一氓商谈，达成中共与川、康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同时，由刘湘资助红军一笔现金，购买大宗食盐、布匹、药品等急需物资，运回陕北。张澜为中共与刘湘终于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深为庆幸。

“七·七”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派罗世文、廖志高、于江震、贾子群以及王干青等自陕北陆续回川，与张澜联系，便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抗战军兴，除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以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的身份公开活动外，中共川北工委书记于江震在张澜的掩护下，接受张罅转交的中共在川北一些地下组织的关系，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党在川北的地下组织。于江震恢复的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就设在张澜家乡住宅附近的小学校内，一直得到妥善的掩护。贾子群在张澜的帮助下，在南充创办建华中学，由鲜英任董事长，张澜负校长名义，贾子群任副校长，赵其文等共产党员主持教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使该校成为川北地下党的重要据点之一。王干青则在张澜主持的民间慈善团体——成都慈惠堂任总干事兼培根火柴厂厂长，共产党员肖华清、周烈三、吴恩灼、袁观、袁钊、岳小平等均在慈惠堂负重要责任，使该处成为成都地下党的重要据点之一。周恩来副主席还在一九三七年秋介绍杨伯恺从上海回成都，协助张澜开展文化、教育界的统战工作。中共川东特委和川康特委的领导人，长期同张澜保持密切的关系。在张澜的工作范围之内和社会影响之下，他一贯不遗余力地安置、掩护和营救过许多共产党员。先后担任中共南充中心县